

劉禹錫集

吳汝煜 選注

錫

尚

審

不



劉禹錫集卷之四

目錄

三

I214.22

40

# 刘禹锡选集

吴汝煜 选注

齐鲁书社

1989年·济南

B 002003

**刘禹锡选集**

吴汝煜 选注

齐鲁书社出版发行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13.5印张 241千字

1989年11月第1版 1989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 7—5333—0138—2

I·61 定价：4.45 元

## 前 言

刘禹锡（772—842），字梦得，洛阳人，我国唐代的著名诗人，文人词的早期作者之一。他的散文足以名家，骈文与辞赋也写得很好。在中国文学史上，他是一位具有多方面创作成就的重要作家。

—

刘禹锡的父亲刘绪在“安史之乱”时避居江南，曾在嘉兴、湖州等地游宦，刘禹锡也就在这一带出生和长大。在父亲的精心栽培下，他很早就熟读了《诗经》、《尚书》，浏览了诸子百家，还受到著名诗僧皎然和灵澈的指点，并为著名散文家权德舆所器重。这一切对刘禹锡后来的诗文创作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贞元九年（793）登进士第，又登博学宏词科，贞元十一年（795）登吏部取士科，释褐入仕，任太子校书，先后任淮南节度使掌书记、渭南县主簿、监察御史。

中唐时期的社会危机十分严重。藩镇割据破坏了国家统一。朝廷军费支出激增，造成了财政困难。宦官专权，使政治日趋黑暗。由于官府的横征暴敛和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致使农村经济凋敝，阶级矛盾十分尖锐。青年时期的刘禹锡胸怀大志，以天下为己任。他结识了志同道合的朋友王叔文、柳宗元

等人，积极聚集力量，准备在时机成熟的时候施道济世，一展素志。贞元二十一年（805），唐德宗病死，太子李诵即位，是为顺宗。顺宗是一位开明的皇帝，早在当太子的时候就能关心民瘼，向王叔文了解“人间疾苦”〔1〕。即位后重用王叔文施行善政，革除弊政，如宣布蠲免百姓拖欠的一切租赋，禁绝各种杂税和例外进奉，罢宫市和五坊小儿，贬谪声名狼藉的京兆尹李实等。这就是后来史学家们所津津乐道的“永贞革新”。刘禹锡当时由监察御史擢为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又兼崇陵使判官，全力以赴地投入了这场革新运动。但是，由于顺宗在即位之前已患中风不语症，王叔文等人凭借的皇权的威力不能充分发挥，更重要的是站在革新派的对立面的势力太大了。宦官、藩镇和部分守旧的官僚结成了一股强大的反对派势力。他们轻而易举地搞了一次宫廷“内禅”，把顺宗皇帝赶下了台。新即位的唐宪宗对王叔文等人异常反感。结果，王叔文被赐死，刘禹锡和他的好友柳宗元等八人被贬为远州司马，史称“八司马。”

从永贞元年（805）冬至元和九年（814）底，刘禹锡挂着朗州司马的空名，被整整闲置了九年。我国古代很多作家开始时都希望在政治上施展抱负，不喜欢徒以文辞见工。只是在客观条件不允许他们在政治上发展的情况之下，才不得不寄心楮墨，移其才力于篇什之间。刘禹锡正是这样。他曾说：“中途见险，流落不试，而胸中之气，伊郁蜿蜒，泄为章句。”

（《彭阳唱和集引》）他的诗歌创作的数量显著增加，其内容也变得比先前充实、积极和富于生活气息。由于想重返朝廷，他一再向达官贵人上书陈情，但所得到的真心帮助实在太少。他意识到，不仅自己与在朝的新贵处于对立状态，而且官场中

的所谓人情也是靠不住的。这时，他开始向人民靠拢，饶有兴趣地观看朗州人民举行的踏歌、竞渡活动，有时还信步来到妇女淘金的江边，情不自禁地为之赞叹。朗州巫风极盛，其民迎神、送神都要唱歌。刘禹锡为他们写了不少歌词。歌词的内容、形式和曲调都是学习当地民歌的。这使他特别注意研究民歌的美学价值，并使自己的诗歌染上了民歌的情调。另外，有职无权的特殊地位，使他不必再费神去撰写骈四俪六的表、章、状、启，可以自由自在地用古文来写作。他的著名的《天论》、《因论》就产生于这一时期。这些作品使他列名于我国古代唯物主义哲学家的行列而毫无愧色。

元和十年（815）春，刘禹锡与柳宗元等人一起奉召至京。他们满心喜悦，准备重新施展才干，哪知刘禹锡因为写了一首《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诗，得罪执政，又触怒宪宗，连带柳宗元等人一起被外放为远州刺史。刘禹锡为连州刺史，后转夔州刺史、和州刺史。所到之处，都能询访疾苦，解除民瘼，有良好的政声。宝历二年（826）冬，始脱离谪籍，奉调回洛阳。大和二年（828）回到朝廷任主客郎中。他重游玄都观，写了一首《再游玄都观绝句》诗，抒写自己经受两次迫害以后仍然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和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由于裴度的推荐，不久兼任集贤学士，负责校理图书。刘禹锡自称“在集贤院四换星霜，供进新书二千余卷”（《苏州谢上表》）。可见其工作的勤奋。大和五年（831）出为苏州刺史。时逢苏州大水之后，民生凋敝。刘禹锡全力救灾，赈济饥民，招集流亡，仅用两年时间，便使生产恢复，户口增长。刘禹锡因此受到嘉奖，赐紫金鱼袋。苏州人民后来把他与韦应物、白居易一起称为“三贤”，建三贤堂，岁时致

祭。大和八年（834）至开成元年（836），先后担任汝州刺史、同州刺史。开成元年秋，因患足疾，改官太子宾客，分司东都。此后，累迁至秘书监分司、加检校礼部尚书，但均为虚衔。晚年虽然心情苦闷，而“精华老而不竭。”〔2〕“马思边草拳毛动，雕盼青云睡眼开”（《始闻秋风》），“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酬乐天咏老见示》）等句，表明他对生活依然充满信心。“昔贤多使气，忧国不谋身。目览千载事，心交上古人”（《效阮公体》）等句，表明他对理想执着不变。“世情闲尽见，药性病多谙。寄谢嵇中散，予无甚不堪”（《偶作二首》其一）等句，表明他依然愤世疾俗。去世之前，留下了一篇简短的《子刘子自传》，重点叙述他所从事的政治活动，并极口为蒙冤而死的王叔文辩诬。传末自铭云：“天与所长，不使施兮！人或加诟，心无疵兮！”为自己的政治才干未能充分发挥而长抱终天之恨。

## 二

刘禹锡在他的自传中没有一句提及文学活动。这当然不是偶然的疏忽。在他看来，自己的诗文传之永久大概不成问题，但如果后世仅仅把他看成是一个词人，那就有点遗憾了，因为孔子有言：“行有余力，则以学文。”〔3〕儒家是把文词视为笔墨余事的。

应该承认，刘禹锡的诗词创作受儒家的诗论主张的影响比较明显。儒家提倡诗歌的美刺——歌颂与讽刺——作用，刘禹锡诗词的思想内容也大致上可以从这两方面去论述。

先说歌颂的方面。

首先，他的诗笔广泛地接触到了劳动人民多方面的劳动生活，诸如插秧、畚田、淘金、濯锦、栽葡萄、采菱、狩猎等等，他都有细致的观察，都能赋予浓厚的诗意，赞叹之情，溢于言表。《插田歌》描绘了农民的插秧劳动：“农妇白紵裙，农夫绿蓑衣。齐唱田中歌，嚶吟如《竹枝》。但闻怨响音，不辨俚语词。时时一大笑，此必相嘲嗤。”不仅写出了劳动场景，而且还刻划了农民的爱唱、爱笑的精神面貌。作者对此显然是非常欣赏的。《浪淘沙词》歌颂淘金女郎云：“美人首饰侯王印，尽是沙中浪底来。”俞平伯先生说：“盖言王侯贵妇之金钱富贵，尽是从劳动男女在沙中浪底之辛勤劳动中得来。本篇在唐人词中，思想性殊高。”〔4〕这一评价，十分中肯。《采菱行》、《畚田行》、《连州腊日观莫徭猎西山》、《竹枝词九首》之九等，都能以欣喜的心情在平凡的劳动中发掘出动人的诗美。

其次，刘禹锡歌颂了一批名不见史传，但却有一技之长的人物。《武昌老人说笛歌》、《和浙西李大夫霜夜对月听小童吹觱篥歌》、《与歌者何戡》、《听旧宫中乐人穆氏唱歌》、《观舞柘枝》等诗是赠给民间音乐家、沦落的宫中乐人和柘枝舞妓的。《武昌老人说笛歌》写老人一生热爱音乐艺术的精神云：“如今老去语犹迟，音韵高低耳不知。气力已无心尚在，时时一曲梦中吹。”人虽老而爱艺之心弥坚，这是多么可敬！何戡是唐代唱《渭城曲》的高手，与著名歌唱家耿家同见称于时〔5〕，其歌喉的动人自不待言，但在帝王的眼中，何戡等人不过是无足轻重的伎乐，因此正史上没有他们的事迹。刘禹锡不存偏见。他懂得艺术的价值，尊重艺术家的人格，因而听完他们的精采演唱，就以诗相赠。《与歌者何戡》不仅赞美何戡的



歌声动人心弦，而且还高度评价他不以炎凉世态待人的品质。物质生产劳动与艺术劳动都是人类具有崇高特性的实践活动。刘禹锡能够从这方面去开拓诗词创作的题材，已属慧眼独具，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能够从这些平凡的人身上发掘出不平凡的品质，因此这部分诗作的思想价值是不容忽视的。

第三，刘禹锡往往把统治阶级中一部分杰出人物引为同调，推敬、颂扬之意每形篇什。《平蔡州》三首，按照刘禹锡自己的说法是：“美李尚书翹之入蔡城也。”〔6〕《美温尚书镇定兴元，以诗寄贺》，一看题目就知道是赞美温造镇压兴元兵变的。兴元兵变由宦官所策划，镇压这次兵变，对宦官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刘禹锡与中唐著名宰相裴度志同道合，对裴度的相业由衷钦佩。《郡内书怀献裴侍中留守》是一首难得的好诗。其中“天子旌旗分一半，八方风雨会中央”一联，气势不凡，历来备受赞扬。

此外，刘禹锡还写了不少歌唱祖国大好河山、探访名胜古迹和欣赏名花珍禽的诗。这些诗有的掺和着作者的理想，如《华山歌》；有的挟有不平之鸣，如《九华山》；有的流露了哲理的思考，如《巫山神女庙》；有的寄寓着作者自己的品格，如《赏牡丹》、《白鹭儿》等。

次说讽刺的方面。

刘禹锡是一位出色的讽刺艺术家。他的讽刺诗作象鞭子一样抽打着那些可笑、可鄙和可恶的势力以及社会上的黑暗现象。他为此受到过严重的迫害，但迫害者并没有逃脱他的惩罚。他以自己杰出的讽刺才能成功地涂白了他们的鼻子，让他们的丑恶形象遗臭万年。早在刘禹锡参加永贞革新之前，他就留意观察社会上的弊病，写有《养鸷词》以讽刺禁军无能，写

有《武夫词》以讽刺畿内军镇将卒的横暴，写有《调瑟词》以讽刺过重的赋役剥削。永贞革新以后，他的讽刺诗作不仅数量显著增加，而且锋芒更为锐利，思想更为深沉。《聚蚊谣》、《百舌吟》、《飞鸢操》、《昏镜词》等篇对当时朝廷上的宦官、佞臣、权奸甚至昏庸的皇帝都作了穷形尽相的揭露。自玄都观诗案以后，他的讽刺诗作的风格有所变化：感情趋于内向，语言变得冷隽，思想更为含蓄。他常常借助咏史、怀古的篇什来针砭现实。著名的《金陵五题》、《金陵怀古》、《西塞山怀古》、《三阁辞》等就是这一类诗作的代表。

应该指出，刘禹锡诗中的封建性糟粕也比较明显。大量的官场应酬之作常常流露出羡慕门第、向往富贵的庸俗观念；整整一卷的送僧诗，充满着佛家的消极出世思想；即使在传诵的怀古名篇中，也带有浓重的伤感色彩。这些当然不是刘诗的主流，但毕竟是不健康的。

刘禹锡十分重视诗歌艺术的创新。他的诗既不象韩愈那样奇崛怪僻，又不象白居易那样浅俗直露，而是另有一种风味，其特点是：取境优美、精炼含蓄、韵律自然。

诗歌的取境问题在皎然的《诗式》中有明确的论述〔7〕。刘禹锡师事皎然，在诗歌创作中特别注意诗境的创造，曾说：“虑静境亦随。”（《和河南裴尹侍郎宿斋太平寺诣九龙祠祈雨》），并提出了对于诗境的总的审美要求：“因定而得境，故翛然以清；由慧而遣词，故粹然以丽。”（《秋日过鸿举法师寺院，便送归江陵》小引）“清”和“丽”是刘禹锡追求的至境。这种至境，往往寓明丽于高远之中，绚烂华赡而不失之繁缛，趣远情深而又鲜明如画。他的《竹枝词九首》、《竹枝词二首》、《浪淘沙词九首》等，取境都很优美。读过以后，

掩卷静思，富于地方色彩的南方少数民族的劳动场面、青年男女的健康活泼的爱情生活、祖国河山的壮丽秀美景象，历历如在目前。他的诗歌词采丰富。张为撰《诗人主客图》，列刘禹锡为“瑰奇美丽主”的“上入室”一人，可见唐代人就 very 看重他的词采。刘禹锡明确主张诗歌应“以才丽为主”（《唐故中书侍郎平章事韦公集纪》）。凡是该施藻饰的地方，他从不靳惜，如以“凤阙轻遮翡翠帟，龙池遥望麴尘丝”（《杨柳枝词》）形容新春嫩绿的柳条，以“玉琴清夜人不语，琪树春朝风正吹”（《翰林白二十二学士见寄诗一百篇因以答贶》）形容白居易诗境的雅丽自然，都新颖可喜，形象优美。

关于诗歌的精炼含蓄问题，刘禹锡有两句名言常为人所引用。一是“片言可以明百意”，二是“境生于象外”。前者是说诗歌应该辞约义丰，以一当十，后者是说诗人往往得意忘言，寄托深远，在物象之外，另生妙境。精炼与含蓄，在诗歌中往往是统一的。他的《石头城》、《乌衣巷》、《西塞山怀古》、《昼居池上亭独吟》等诗，都千锤为字，百炼为句，极为精警，同时又意境渊永深邃，极为耐人咀嚼。《和乐天春词》、《庭竹》、《视刀环歌》等篇，于精炼含蓄之外，别有寄托，细加体味，都可以从诗人的政治生涯中找到题外重旨。

明朝胡震亨说刘禹锡的诗歌“语语可歌。”〔8〕刘禹锡自己也说：“歌词自作别生情。”（《和乐天南园试小乐》）可见很重视诗歌的音乐美。宋本《刘宾客文集》卷二七注云：“右已上词，先不入集，伏缘播在乐章，今附于卷末。”这条注文不会晚于宋代，可见在宋以前，他的部分作品还在传唱。《竹枝词》的写作是刘禹锡对民歌曲调认真学习的结果。白居易就

曾说：“梦得能唱《竹枝》，听者愁绝。”〔9〕从音乐美的角度看，刘禹锡的《竹枝词》前两句主要吸取了七绝声律谐婉的特点，后两句又保持了民间传唱的《竹枝词》在曲调上凄凉怨慕的特点，兼有两者之长，做到和谐与拗怒的递用，并采用谐声双关、重迭回环等艺术手法，使之更加符合天地自然之声。其他五七言小诗也都音韵浏亮，节奏鲜明，如孤桐朗玉，自有天律。他的古诗也具有民歌的音乐美，如《平蔡州三首》其二第一句就化用了汝南民歌中的句格意韵。全诗读起来琅琅上口，清翁方纲赞之为“以《竹枝》歌谣之调，而造老杜诗史之地位”〔10〕。对诗歌音乐美的重视，导致了刘禹锡对依声填词的兴趣。他的《和乐天春词依〈忆江南〉曲拍为句》两首，是我国文学史上开始出现依曲填词的记录。龙榆生先生说它“为后来‘倚声填词’家打开了无数法门，把文学上的音乐性和音乐曲调上的节奏紧密结合起来，促进了长短句歌词的发展”〔11〕。所见十分正确。

中晚唐重要诗人如白居易、姚合、温庭筠都对刘禹锡非常钦佩。按照陈寅恪先生的看法，白居易是很想取法刘诗，以克服自己创作中辞繁言激之病的。〔12〕姚合有“仰德多时方会面，拜兄何暇更论年”（《寄主客刘郎中》）之句。温庭筠有《秘书刘尚书挽歌词》二首，从书法、诗艺、人品等方面对刘禹锡作了很高的评价。他的诗词注意词采，也与刘禹锡多少有些关系。自唐代以后，刘禹锡的诗歌继续发生重要影响。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等人都在不同方面、不同程度上汲取刘禹锡的诗艺营养。陈师道说：“苏轼始学刘禹锡，故多怨刺。”〔13〕这当然是不错的，但却隐瞒了自己学习刘诗的苦心。在他的《后山诗集》中，从刘禹锡诗歌中化出的诗句约有

二、三十处之多。黄庭坚、陈与义也有类似的情况。江西诗派的理论家们把这种做法称之为“夺胎换骨”。南宋的重要诗人陆游、刘克庄等对刘禹锡的诗歌也很爱好。刘克庄在他的《后村诗话》中列举他所喜欢的刘禹锡名篇竟有三、四十首之多。元、明、清以来，刘诗的影响主要在《竹枝词》方面。其作用，不仅是引出了蔚为大观的富于各地地方特色的《西湖竹枝词》、《扬州竹枝词》、《成都竹枝词》、《北京竹林词》、《潍县竹枝词》等，而且更重要的是，“自后凡较进步之作家，咸知联系民间，模拟民间，已相率形成历史传统”〔14〕。这是刘禹锡在中国诗歌史上的重要贡献。

### 三

北宋姚铉在《唐文粹序》中列举唐文之“雄杰者”十人，其中就有“刘宾客禹锡。”南宋谢采伯说：“唐之文风，大振于贞元、元和之时。韩、柳倡其端，刘、白继其轨。”“皆足以拔于流俗，自成一家之语。”〔15〕刘禹锡自己也以中唐古文家自命，曾在一篇文章中转述李翱的话说：“翱昔与韩吏部退之为文章盟主，同时伦辈，惟柳仪曹宗元、刘宾客梦得耳。”（《唐故中书侍郎平章事韦公集纪》）持平而论，刘禹锡在中唐古文运动中是有一定地位的。他的散文创作也取得了重要的成就。

韩愈倡导古文运动是在贞元十二年（796）开始登上仕途以后，而真正产生影响，是在贞元十八年（802）调任国子监四门博士以后。刘禹锡在贞元十年（794）写的《献权舍人书》中，就表示了他对于“直绳朗鉴”的古文的爱好和对于“泥溺

于浮华”的骈文的反感，并提出了“见志之具，匪文谓何”的文论主张。后来韩愈提倡古文运动，刘禹锡带着自己丰富的散文创作，集合到古文运动的大纛之下。这与他爱好古文的素志有关。

刘禹锡的散文以论说文的成就为最大。他自己也以此自负，在《祭韩吏部文》中说：“子长在笔，予长在论，持矛举盾，卒不能困。”这一说法，曾遭到王应麟的讥评〔16〕，但清人李慈铭认为王应麟的讥评是不正确的，说：“王厚斋笑其不自量，未为知言。”〔17〕《天论》、《因论》、《华佗论》、《辩迹论》等都是刘禹锡论说文中的重要代表作。其特点，一是富于卓识。《天论》是我国唯物主义思想发展史上的重要文献之一，其识见高卓自不待言。《辩迹论》只有短短数百字，却阐明了如何正确评价历史人物的功绩问题，提出了“慕贤者当慕其心”一类不同流俗的看法，实际上是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因此也是以识高取胜的。二是因小见大。《因论》中的《讯眈》、《傲舟》、《鉴药》、《说骥》都有这个特点。《鉴药》写自己生病就医的体会，从医病，联系到医国，指出“循往以御变，昧于节宣”，即死守敝法和不懂得适可而止的危险。《说骥》从一匹马的遇与不遇，阐明了识别与选拔人才的不易。这都可以说是从小处落笔，而从大处着眼的。三是巧丽渊博。他的论说文巧于用事，富于文采，思想深邃，内容广博，因此柳宗元曾用“文雋而膏，味无穷而炙愈出”〔18〕来形容刘禹锡的论说文特色，可谓知言。

刘禹锡的记叙文也有佳作。《救沉志》、《洗心亭记》、《子刘子自传》等篇状物鲜明，叙事简洁，不仅立意高远，而且有的还大胆地抨击了宦官，富于战斗性。李慈铭说：“中山

(刘禹锡郡望)叙记诸文,简洁刻炼,于韩、柳外自成一子。”〔19〕  
这一评价比较中肯。

应该承认,刘禹锡的骈文也是写得好的。当时的谢表、章奏、状启都要用骈文,刘禹锡入仕以后当然离不开它。他向皇帝所上的表状,叙述事理,抒写衷曲,委婉得体。《为淮南杜相公论新罗请广利方状》等篇,便是他的骈文的代表作。

中唐时期辞赋比较兴盛,这也许与辞赋被列入考试科目有关。刘禹锡传世的辞赋共有十篇(本集载九篇,《全唐文》多载一篇),篇篇都是杰作。《砥石赋》通过一把生锈的宝刀经过磨砺以后重放异采一事,抒发了作者自己慷慨的情怀:“既赋形而终用,一蒙垢焉何耻?感利钝之有时兮,寄雄心于瞪视。”在这篇赋中,作者还发表了要以法制砥世,借以造就和保护人才的想法。《秋声赋》一反宋玉悲秋的老调,表现了自强不息的精神。《山阳城赋》借古喻今,表现了作者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注。这些赋作的总的特点是思密藻赡,志广情深,既有他的诗歌的韵味,又有他的散文的卓识,兼取两者之长,因此读来饶有兴味。

最后,谈几句有关这个选本的话。

元和十三年(818),刘禹锡曾自编己书为四十通,又删取四分之一为《刘氏集略》。这说明,刘禹锡在世时是希望自己的作品能以全集和选集两种形式流传后世的。遗憾的是刘禹锡的希望有一半落了空:全集是流传下来了(尽管不是他自编的那一种),但《刘氏集略》却早已亡佚,因此,在认真研究刘禹锡的生平、思想和文学主张的基础上,编一本《刘禹锡选集》,这是符合刘禹锡原意的。

今存刘集古本主要有三种：一是清避暑山庄旧藏宋绍兴八年（1138）董棻刻本，题为《刘宾客文集》，属小字本，今有徐鸿宝影印本。又淳熙十三年（1186）陆游据董本重刻，称浙本。明、清以来通行的刻本，基本上属于这个系统。二是日本平安福井氏崇兰馆所藏宋刻本，题为《刘梦得文集》，属蜀大字本。今有董康影印本。《四部丛刊》本《刘梦得文集》基本上属于这个系统。三是北京图书馆所藏宋刻残本《刘梦得文集》一至四卷，建安坊刻本。本书所选诗文，即以《四部丛刊》本《刘梦得文集》为底本，并参照其他善本作了校勘。因为考虑到中华书局将有比较完善的《刘禹锡集》点校本问世，本书就不出校记了。

本书在选注过程中，力求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美学观和文艺观精选刘禹锡各个创作时期的代表作品和各种体裁的优秀篇章。共选诗171首，词33首，文17篇，赋3篇，合计224篇，约当全集的五分之一强，若就诗、词而言，则约占刘禹锡全部作品的四分之一强。为了尽可能把刘禹锡的传诵名篇包括进来，曾参考了自唐人所选《又玄集》以下的多种选本。其中主要的有方回的《瀛奎律髓》、杨士宏的《唐音》、高棅的《唐诗品汇》、钟惺与谭元春的《唐诗归》、王夫之的《唐诗评选》、金圣叹的《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沈德潜的《唐诗别裁集》、管世铭的《读雪山房唐诗钞》等。本书在评析和注释部分随手引用的评语，很大部分采自上述诸书；本书用分体编排的做法，就沿袭了他们的老传统。不过，传统的选本在编次上不大注意作品的写作时间的先后，本书则尽可能将各类作品按写作时间的先后顺序排列。这样做，一则有助于从文体方面判别出一个作家的主要成就，二则可以窥见这个作家运用各种体



裁进行创作的艺术才能的发展和艺术风格的变化的轨迹。这对刘禹锡作品的欣赏者和研究者来说，也许能够提供较多的方便。由于有些作品的系年至今还搞不清楚，因此就编排的先后次第而言，只能说是大致如此而已。刘禹锡的全集向无注本。近年来出版的几种《刘禹锡诗文选》在注释方面做了不少拓荒工作，这是有功于广大读者的，对刘禹锡的研究者也很有帮助。本书在选注过程中曾从中获得了很多研讨的线索，取得了有益的借鉴。本书所选诗文的编年，主要参考卞孝萱同志的《刘禹锡年谱》。陶敏同志惠赠的《读刘禹锡诗杂记》（连载于《湘潭师专学报》1981年第1期至1982年第3期），也有几则关于作品系年方面的意见为本书所采用。齐鲁书社的任笃行同志查阅了很多文献资料，对本书初稿中的注释提出了不少中肯的修改意见。谨此说明，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本书应该选而未选、不该选而入选的情况，作品系年的不当，注释与评析中的错误与疏漏，均知难免。恳切地期待着专家与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教。

#### 注释：

〔1〕韩愈《顺宗实录》五。

〔2〕刘克庄《后村诗话》前集卷一。

〔3〕《论语·学而》。

〔4〕俞平伯《唐宋词选释》。

〔5〕《全唐诗》卷五百十一张祜《耿家歌》：“十二年前边塞行，坐中无语叹歌情。不堪昨夜先垂泪，西去阳关第一声。”此篇与另一首《听刘端公田家歌》归于《听歌二首》下。

〔6〕《唐语林》卷二《文学》。

〔7〕《诗式》：“取境之时，须至难至险，始见奇句。”“夫诗人